

20世纪中国思想史

启良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新 心 的 世 界

启良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 / 启良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360-5347-2

I. 2… II. 启… III. 思想史—中国—20 世纪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8366 号

责任编辑: 孙 虹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王 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5 1 插页

字 数 50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绪论一：国问

一部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一位西方圣人即卡尔·马克思的思路而谱写的。马克思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神王宙斯那里盗取火种，还教会了人类许多技艺。自此，人类得以发展下来，直至今天的繁荣。马克思同样为了人类，同样给了人类火种。只不过，马克思的火种不是用来照明取暖，烧菜做饭，而是革命暴力的燎原之火，为的是烧掉旧世界，并在其废墟上建立一个金灿灿的新世界。

马克思是一位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不仅乐观地估计自己的思想力量，而且乐观地认定未来人类必将生活在一个至善至美的社会。

在马克思的眼里，应予烧毁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个是西欧以外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这两个世界是有等差的。资本主义虽然罪恶，但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则又是进步的。因之在他看来，欲将印度、中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古老民族一并带到新世界，就必须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之进行血与火的洗礼。请看他老人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下的一段话：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然而，历史的逻辑同理论的逻辑毕竟不是一回事。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至善至美的社会必然到来，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欲得新生，必经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可时至今日，世界历史似乎并没有朝着他老人家预言的目标和路径而发展。特别是，他理想中的新世界并非结胎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母腹，而是在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见诸实践，而这些国家几乎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也许会最终灭亡，但在 20 世纪却没有灭亡的迹象，而且其最终灭亡的方式亦恐同《资本论》所描述的大为不同；世界大同也许不是空想，但实现的途径很可能是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和暴烈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还写道：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这段话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写下的，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是时的资本主义虽发展蓬勃，但毕竟处在“初级阶段”，并且毛病甚多，尤以牺牲其他民族利益为代价而体现为不人道，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毛孔都充塞着肮脏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激起了多少思想人物道义上的愤怒。然而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形态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毕竟是一新生事物。作为新生事物，它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决不会因其稚嫩易犯错误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权利，也不会因人们的道义愤怒而终结自己的历史，真可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再者，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产物，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内在地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人性根据，有其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在没有完成其世界历史使命之前，亦不会因人们的好恶而半途而废。

更可重视的是，对于新生事物的成长和壮大，批评更益于赞美。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通过对其经济结构的分析而认定不可救药。然而马克思也好，圣西门等人也好，都是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的一员。尽管他们厌弃资本主义，试图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却又有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完善。这真是历史的吊诡！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看病，写出病历，指出病根，且开出促其死亡的药方。可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和政要虽不采纳马克思的药方，但却重视他所写下的病历，且据此而对症下药，从而将资本主义从稚嫩状态引向成熟状态，使之避免了“初级阶段”的诸多弊端，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劳资关系的紧张。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愈益世界化，资本主义亦愈益稳定和繁荣。虽然其间有两次世界大战，有两大阵营的对立，但总的来说，一直呈上升的趋势。现在所谓的“世界化”、“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仍是西方化；所谓“与世界接轨”，亦主要是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像印度、俄罗斯、阿拉伯世界这样的民族或地区，尽管文明悠久，人口众多，但却不能作为接轨的典范，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不能充当此种历史角色的。因为“接轨”也好，“全球化”也好，实则都是文化传播和文化选择的向度问题。谁的文化先进，谁就可以主领世界大潮，成为其他民族效仿的榜样。其关系，如果套用孟子的话说，乃是“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任何封闭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只能是一种“厢

愿”。

近代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历史，起初所抱持的便是此种“厢愿”。不管是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主张的提出，还是随之而来的洋务实践，皆不外乎对世界历史的拒斥。虽然这时候的仁人志士已经可以开眼看世界，但其目的仍在关起门来，拒外来文化于千里之外。真正促使近代中国人世界历史意识之自觉的是甲午海战。自此，国门渐次打开，外来文化潮水般地涌进中华大地，国人亦由此艰难地踏上了现代化的行程。

由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再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直至今日的改革开放奔小康，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变化可谓大矣。倘若以传统社会为参照，更可见其变化地覆天翻。人们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已完全不是传统的样子。帝制早已终结，家天下永远成了历史，社会的主奴结构至少从形式上看不复存在，无人再以“奴才”自称。经济关系方面，不再有地主与佃农之区分，亦不再有交租或抗租之类的事情。从理论上说，人人都是社会财富的主人，人人在法律上都享有经济上的平等权。社会财富亦远非传统社会可以比拟，国民生产总值虽成曲线发展，但总的看来却是呈增长的趋势。相应的，国民的生活水平亦大大提高，衣食住行同传统的生活方式相比，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特别在人们日常生活方面早已西方化。从发型到服装，从建筑到家具，从书写工具到口头用语，从婚姻形态到教育模式，几乎没有哪一方面不是西式的。

然而，近百年中国之发展，成绩虽曰显著，但问题亦不可忽视。特别是将其放在 20 世纪整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更能发现其步伐的缓慢与错乱。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百年中的繁荣，姑可不论，仅拿亚洲几个近邻作比较，亦可使今日的炎黄子孙愧对列祖列宗。岛国日本文化浅薄，资源匮乏，但却发展成了世界级的经济强国；韩国、新加坡虽只有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成绩亦远非今日的中国所能比拟；就连同为中华民族的台湾和香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经济亦远比中国内地繁荣和富足。

为何会是这样？是因为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人口多底子薄，还是因为中国人惰于进取？中国具有几千年的文明积累，底子并不为薄；人口众多亦不是贫穷落后之原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足可承载十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中国人并非不思进取，特别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更是如此。他们为着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呕心沥血，前仆后继，其奋斗与牺牲的精神实乃其他民族知识阶层所不及。

尤可深思的是，在这百年里，我们所拥有的自然时间同其他民族并无差别，都是一同进入 20 世纪，今天又一同跨入 21 世纪，可是在历史时间方面，我们与其他先进民族并非同步。从 19 世纪末到今天，已是一个多世纪之久，可是吾国吾族似乎仍在原地踏步。虽然今日之中国相对于百年前，许多方面早已面目全非，但历史的位置却依然停留在百年前。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富国强兵，先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维新。洋务运动之主旨是向西方人学习先进技术，亦即魏源所说的“师夷之长技”。当时委派留学生，翻译西人著作，都是为着这

一目的。只是在洋务失败（其实很难说是失败）之后，康梁等人才试图在政治层面上作文章。然而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一历史又得以重演。同样是打开国门，同样是外派留学生，翻译西人著作和引进外国技术，同样是在器物层面之革新难以深入的情况下需要政治体制的变革。虽然这重演的历史不可能没有异样，但其历史的曲线则大体上是一致的。

然而另一个事实是，这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风雨兼程，坎坎坷坷。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有理想有豪情，有大爱有大恨，在民族振兴与更新的道路上从未停歇过，至少在主观愿望上是如此。不管是辛亥革命、解放战争，还是大跃进和十年“文革”，乃至今日的奔小康，他们都是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既可歌又可泣。

一方面，中国人极思进取，并且在百年时间里把一部中国历史一再改写；可另一方面，时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似乎仍然停留在百年前的历史位置。

这样一种悲剧性的历史实在值得吾人深思。

一 中国为何很难踏上现代化的道路？

作为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运动，虽然很难界定其起点，究竟是新大陆的发现，还是尔后的西方工业革命，甚或别的历史性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英国革命、启蒙运动等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类历史，现代化的历史已经有了几百年之久。这一历史运动的推进虽曾借助血与火的方式，给许多民族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但总的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痛苦是暂时的，局部的，而且不可避免。正如马克思借用歌德的诗句所表述的：“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现代化进程中的“痛苦”，在今日学者看来，诚然是多方面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对人文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伤害。但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此种“痛苦”则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掠夺，以及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复存在。用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的话说：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

或许历史的辩证法本该如此：任何历史性的进步都应付出相应的代价。文明的产生以人类原始朴素的生活方式之丧失为代价；古代的经济繁荣以奴隶制的盛行为代价；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以之而求得的心性安顿和友善相处必以禁欲为代价。现代化作为进步的历史运动，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作为人类整体性的历史是如此，作为一国一族的历史亦为如此。代价的付出无疑是痛苦的，但痛苦却又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痛苦”，人类便不能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正因为“痛苦”与“快乐”之间，人们为着后者而不惜前者，所以近代的世界历史才会突飞猛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们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言其主动与自觉，意指人们在这一历史运动中的理性选择和顺应潮流的历史行为；言其被动和不自觉，是指人们虽未认识到这一历史运动的真义和真值，但却能够为历史所带动或驱动。在前者，人是主体，历史是客体；在后者，历史是主体，人是客体。而且在人的历史活动中，主客体是互为渗透的。因为，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造物。

时至今日，作为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已经走完了它的“初级阶段”，就连亚非拉，亦有许多国家迈入现代化的行程，有的还相当先进和发达。虽然现在许多西方学者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指陈现代化的诸多弊端，但现代化作为各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价值则是普适的，而且也是人们的共识。

然而，我们反观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则不难发现，尽管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被“现代”了，但却又很难踏上现代化的路途。或者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很难说是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如果更深入地看，将其视为一部拒斥现代化的历史，或许更为恰当。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现代化犹如一道门槛。他们的双脚虽已迈进门槛，但上半身始终处在门外。虽然他们有时也想探过头来，瞧瞧门槛里面的景色，但总免不了要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拉扯回去。即便有极少数人整个身子都进了门槛，且真正认识到了门槛内外的差别，但这样的人往往为社会所不容，被大众视为异类。

现代化需要付出代价，拒斥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更大。而且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运动中，由于西方列强的扩张和掠夺，中国人丧权辱国，同样有一段“痛苦”的历史。可是在这里，“痛苦”并没有成为“快乐的源泉”，反倒是痛上加痛。如果说现代化运动是人与历史的主客体互动的过程，那么百余年的中国人，主客体都是弱化的。一方面，吾人至今难有现代化的理性自觉；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很难冲破中国特有的闸门。而且这二者同样是互动的，互为条件，亦互为因果。

问题是，无论是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作为本民族社会发展之要求，现代化同样是中华民族的需要。而且吾国吾族历史悠久，积重难返，更需现代思想文化的冲洗和刷新。可是，从经验事实看，一个世纪的中国人又确是拒斥现代化的，始终举着“中体西用”的旗子守住国门。这其中的原因何在？为何在如林的世界各民族中，惟有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对现代化的普遍价值难以认同？为何我们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至今仍未能觉醒？

二 为何现代化在中国总是皮毛的，表面的？

中国人拒斥现代化，并不等于说在这里一点现代化也没有。言其“拒斥”，主要是指对

现代社会所应坚持的理念、原则和规范的拒斥。至于器物层面的东西，中国人早已现代化了，同发达国家相比，只是“量”的差别，程度的差别，而非“质”的不同。西方人有汽车，有电视，有电脑，会用移动电话传递信息，而这一切，现今的中国人同样有，同样会。然而，器物的现代化固然是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但却不能等同于现代化，更不是其核心内容。一个拿着手机玩着电脑的人，很可能同现代精神格格不入。所谓现代化，意指的主要是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因而其主题也就主要在于制度文明和观念文明两个层面。如果一个民族，器物文明非常现代，而制度文明和观念文明仍然停留在传统社会，那么该民族就很难说是现代化的。

文化分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且三者成一结构性的关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难说这三者孰轻孰重，但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文明尤其是观念文明或许更为重要。正惟这样，所以西欧的工业革命之前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之前有启蒙运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思想文化运动，会有现代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中国人的现代化历程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开始的，同样经过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三个层面的发展过程，这就是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的一段历史。可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对先进的器物文明能够接受，且认为是富国强兵的法宝，但对外来的制度文明和观念文明，大多是拒斥的。而且历史愈往后发展，此种态势愈为明显，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学起前清统治者的做法来，闭关锁国，试图以意识形态的樊篱将当今世界主流的制度文明和观念文明挡在国门之外。此种状态，至今亦无多少改变。

诚然，中国人同样是需要民主和科学的，而且这两者是现代化的主题。但是我们切不可以为高喊着“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表明人们对二者有了真正的认识和认同。从新文化运动起，国人就开始拥护这“德”“赛”两位先生，可时至今日，我们实在很难说这两位先生在中国大地上安了家落了户。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国人从心底拒斥西方的制度文明和观念文明。对其拥护，要么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要么是出于单纯的经济考虑。

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度，几千年来一直是帝皇统治。正惟这样，人们对民主才会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情感。然而在 20 世纪，国人一方面为政治的民主而奋斗，另一方面又把自由视为洪水猛兽，却不知二者究竟是何关系，更不知没有自由的民主，民主同专制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是民主政治的内核，没有自由的民主，要么是暴民政治，要么是传统的帝皇政治的变种，根本不可能达到事实上的民主。为何会是这样？根本原因便是我们的国人对于民主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只知其皮毛，不知其根本。正因为这样，这几十年来，人们对于民主所依赖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和相应的学理，如天赋人权、权力制衡、人性论等，都是拒斥的，并且视之为腐朽没落的东西。

又如科学，国人所热衷的仍然只在表层，在“用”的层面，却不知科学的“体”才是最根本的。近百年来，国人的所谓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只是技术的现代化，目的是救国和兴

国。科学为“体”，技术为“用”；科学为“本”，技术为“末”。而且二者之关系亦非中国儒家所理解的体用关系——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在科学技术史上，既有无技术的科学，亦有无科学的技术。20世纪的中国，虽然我们不能断言其科学与技术是完全分离的，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它的现代化同科学精神大体上是背道而驰的。何谓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怀疑、批判和自由，亦即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或如海德格尔所言“我在故我思”。而这些，在20世纪的中国不仅没有市场，而且也是不允许的。倘若拿同时期的西方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两地恰成一鲜明的对比：西方科学主义盛行，而在中国盛行的则是“主义”科学。科学一旦为“主义”服务，被“主义”笼罩着，也就不再是科学了，顶多只能视为一种现代经学。

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的文化是一结构性的关系，现代化亦是三者与时俱“化”。几十年前，胡适和陈序经等人所谓的“全盘西化”和“充分的世界化”等提法，都是这个意思。可是在中国，胡适和陈序经等人的声音很难得到共鸣，人们更多地相信“中体西用”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类的说法。其实，“中体西用”云云都只能是一种皮毛的现代化，既不合文化发展与传播之规律，更无助于中国社会的更新。况且，文化三个层面的结构性关系乃是一种常识，学理并不深奥，亦并非具有充分的学养方能理解。但问题是，如此明白的道理，为何国人总是难以明白呢？为何他们总是钟情于一些皮毛的东西，而对真正有助于民族更新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拒之于国门之外？难道中国人没有自由也可告别专制传统，拒绝科学理性也可发展科学？

三 罪在古人抑或今人？

现代化并非空穴来风，很大程度上乃是传统的产物。现代化的历程始于西欧，原因便在于这里有现代化产生的历史文化传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传统，现代化的起点会在西欧。

但这并不是说一切历史现象都是传承的关系，其中有渐变亦有突变。只要有变，就会有发展有创新，有新旧之更替，特别是突变，更是意味着历史形态与文化形态的根本转换，而且是全方位的。但是即便如此，传统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因为任何创新和变革都只有基于传统才有可能。

正是由于这样简单的道理，一些现代化步履维艰的民族往往将其现实的不顺和不幸归因于传统，归因于古人。

中国的文化传统极其深厚，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亦是巨大的。惟其如此，所以几乎从进入20世纪之日起，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就一直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从梁启超的“破坏主义”到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从科玄论战到新儒家主张的正式提出，从80年代的新启蒙到90年代保守主义的盛行，一个世纪里，思想界的新进人物似乎不在传统与现

代之间发表意见，就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和责任。他们的意见或许完全相左，要么是传统的，要么是西化的，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是对传统的看重。在传统派看来，现代中国必赖于儒家思想的指导，才不会失去立人与立国的根本；在西化派看来，惟有对传统思想作彻底的清算，现代中国才有可能新生。所以，不管他们是对传统的捍卫还是对传统的批判，都是把古人摆在重要的位置。

其实，现代中国的艰难，古人何罪之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亦有其相应的解答方案。思想家的意义就在这里，亦仅此而已。就孔子而言，他的使命是教导人们“克己复礼”，以匡正当时“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至于两千多年之后的中国人该怎样营建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孔子是想不到的，而且也不应该由他来想。如果一切都在两千多年前由孔子设计好了，还要现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干吗？对于孔子的评价，只视其对当时社会的贡献如何，而不能将其看作万世皆准的绝对真理的垄断者。20 世纪的中国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现实问题，其解答方案也只有依赖于现代的志士仁人的理性思考，而不能一切从古人那里找答案。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人是传统的产物，传统的思想形态和观念形态对现代人的影响既深且巨。现代化，重要的是制度和观念的现代化。而这二者之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传统的态度，即对传统必须有所疏离，有所批判。特别在中国，尤其显得必要。因为像儒家这样的思想传统早已深入国人的血脉，内化为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如果不予深度的反思和批判，势必成为现代化路途的阻力。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即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并非清算古人，更非数典忘祖，而是对现代各种保守主义的批判。因为传统于现代的阻力，既来自于传统之本身，更来自于现代各种保守主义对传统的捍卫。或者更准确地说，传统有碍于现代，罪不在古人，而在今人对传统没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态度。

从世界范围内看，传统有碍于现代，并非中国特有之现象。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俄罗斯和日本都曾有过外来文化同本土文化的冲突以及由之而引发的文化论争。但是，这些民族的本土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让位给了外来文化。尽管时间有先有后，代价有大有小，但时至今日，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世界化了。惟有中国，文化论争的时间最长，保守主义一直占着主流地位，以至于 21 世纪的今天，许多人还沉浸在“21 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之梦乡里。

为何中国人格外眷恋传统？是传统本身之魅力，还是现代国人的无知与迷妄？保守主义者的保守，究竟是出于纯学理的思考，还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他们歌颂孔孟，歌颂传统，究竟是对古人的尊重，还是对古人的不敬？是不是把古人不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到了古人的肩上？现代化的道路，靠的是现代人的选择。自己选择的失误以及由之而灾祸频生，完全是现代人自己的责任，怎么能够怪罪古人呢？如果说传统对现代的影响深远，那么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对传统的深度反思。然而我们回顾百余年来文化论争，不难看出，人们多是道

义的激动，多是卫道士的作派。因而问题的实质又在于，20世纪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捍卫的“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儒家的那一套在他们看来如此重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们仍然对儒家思想用情至深？

四 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下的中国哲学界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大学、研究所都喜欢以此为课题，或申请政府资助，或为博士点或硕士点开设新的研究方向。相应的，学者们的成果也就多了，车载斗量。在研究者看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亦可视为三个发展阶段。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无疑是绕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是如此。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仅仅等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恐怕问题没有这样简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学术性的课题，首先欲明了的应该是：第一，马克思为何能够中国化？是其理论价值的普适性适宜于中国的文化土壤，还是中国特殊的思想文化传统使之可以在中国土地上大行其道？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化”的过程，那么这“化”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所“化”，还是中国被马克思主义所“化”，甚或二者一拍即合？“化”必有一个“化”的主体，这主体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甚或二者互为主体？

欲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先将马克思主义同东方其他民族之关系作一简单的回顾，或许大有帮助。

先说日本。我们的教科书上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的是通过日本人这一中介。20世纪初，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一批日本学者心仪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且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可是日本人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日本化。

再说印度。印度是亚洲被殖民化的最早的国家之一，同西方文化的正面接触也早。但是印度人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感兴趣。虽然在20世纪同样有共产党，同样有社会主义倾向，然而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从来没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再说俄罗斯。俄罗斯是一个“半亚细亚”国家，同西欧的文化渊源颇深，所以是东方社会最早接受马克思学说的国度。非但如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而且，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亦可看做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结晶。可是，这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化的国家在经过七十多年后，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回到了资本主义阵营。

相比于上述三个国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同马克思主义之关系上，特点十分明显。

第一，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较晚，但受其影响最深。第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拥护和捍卫的态度最为坚定。

这样，我们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问题时，就不得不首先思考如下几个问题：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世界，为何在西方不能发挥光大，反倒是在东方社会拥有广阔的市场？二、按照马克思自己的历史理论，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为什么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肥土沃地？三、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儒学占据主导地位，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观、政治观、是非观和价值观。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所要解决的便是同儒学的关系问题。然而我们回顾近几十年的中国思想史，除极少数人（如牟宗三）以儒者的立场抵制马克思主义外（而且也不是学理性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并未发生过冲突。那么问题是，是二者的相互宽容，还是二者在基本理念上的一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人的全民信仰何以可能，其同传统儒学的民本主义、仁政德治、替天行道等价值追求有何内在的联系？

五 “革命”何以成为世纪性的历史主题？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20世纪的中国，“革命”的口号喊得最为响亮，“革命”的行为最为激烈，甚至连“老大哥”苏联亦不及。

自从进入这一个世纪之日起，革命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先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廷，接着就是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进入20年代后，更是旷日持久的“工农革命”，以推翻蒋家王朝为目的。1949年之后，无产阶级虽然专了资产阶级的政，农民专了地主的政，但革命仍未停息。特别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真可谓“史无前例”。“文革”虽已结束，但革命情怀以及革命的方式并未因“文革”的结束而结束，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90年代的反自由化，都可看做“文革”的余波，同样是革命文化之命。

不可否认，近世的西方世界同样是革命频仍，有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有工业革命，有“哥白尼革命”等等。然而相比之下，除政治革命外，西方革命更多的是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更为明显的区别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所革掉的是文化之本身，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愚昧对知识的践踏；而西方的文化革命，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乃至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哲学领域的康德革命，乃是将文化不断刷新，将思想不断深化，体现的是知识的进步和文明的完善。就连雷鸣般的尼采哲学亦复如是。

革命，尤其政治领域的革命，总是同暴力相伴，同“运动”相伴，故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体上是由一幅幅血与火的画面构成的。革命不断，“运动”不断，而每一次革命或“运动”都是对象化的，即必有一部分人作为革命或“运动”对象。革命的对象亦即专政的对象，“运动”的对象虽不一定对之实行专政，但却同样是革命的异类，是另一种人。这样的人一旦被对象化，政治权利，人身自由，甚至婚姻家庭都要受到伤害，许多人还因之家破

人亡。

革命固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代价的价值则又取决于革命是否正当。我们虽不能说每一次革命都是没意义的，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20世纪中国的诸多革命与“运动”，意义恐怕有待重新考量。正惟如此，李泽厚才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在李泽厚看来，就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既“未必必然”，亦“未必必要”，因为从当时中国的情况看，完全有可能像英国和日本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其实，李泽厚的所谓“告别革命”并未深入到中国问题之实质，认识只能说是感性上的。理由是，欲断定革命在20世纪有无必然或有无必要，首先必须思考的问题是：第一，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里，有无君主立宪之可能？英国和日本可以君主立宪，难道中国就一定可以步其后尘？第二，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为何中国人对革命情有独钟？为何格外喜欢“运动”？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的任何历史行为都离不开他的价值思考，尤其在社会道路的选择以及社会变革之方式问题上更是如此。再者，人创造历史，但同时又是历史的产物，其历史活动必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同时亦说明，革命在20世纪中国受到格外的重视，必有其深层的原因。因而我们对该问题的思考，也就必须深入到如下一些问题：一、革命有多层面的，为何中国人所喜的主要是政治革命？二、古代中国的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十分看重以文化秩序规范政治秩序，为何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总是为政治服务的，且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究竟是传统的影响，还是20世纪的新现象？三、中国人并不好斗，儒家还主张“和为贵”，可是20世纪的中国人却喜欢革命，喜欢斗争，喜欢将人分为敌我两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又是为什么？四、中国古代亦有“革命”之一说，尤其儒家更是宣扬“替天行道”，历代频繁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便是此种观念之产物。问题是，20世纪中国在政权形式上早已告别了传统的模式，为何其“革命”及其同政权之关系给人的印象依然是古代历史的重演？特别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非传统的儒学，而是马克思主义，难道说在“革命”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同中国的儒学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五、在古代中国，“革命”的合理性是用来说明政权合理性的，而在20世纪，中国政权的合理性难道仍需“替天行道”的理论模式予以说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所谓“革命的政权”为什么一定要以“革命”为其存在的根据？舍此，难道就找不出别的更为充分的理由？六、20世纪的中国人特别喜欢革命、喜欢“运动”，政治热情格外高涨，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觉悟高，还是由于其政治的无知与盲动？或者更进一步说，他们乐于革命和“运动”，人性根据是什么？特别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如“文革”），是什么导致他们连起码的人道和是非观都被丧失？

六 实践的偏差还是理论的过失？

毋庸讳言，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是走了弯路和歧路的。正因为如此，21 世纪的今天，我们相比于先进的国家，不知落后多少年，至今还处在“第三世界”。

诚然，20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多事的年代，也是一个大转型的时期。先有外国列强的侵略，军阀割据的纷争，再后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两党的长期较量。这一切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但是，我们将这一百年的历史稍作回顾，又会发现，妨碍民族进取的消极因素又绝非仅仅这些。这一个世纪里，前五十年为战争年代，后五十年为和平年代。照道理，前五十年内忧外患，社会发展之不顺，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处于和平年代的后五十年，社会发展之状况同样不甚理想，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处于停滞、混乱乃至倒退的局面。即便 80 年代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但问题依然不小。特别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前进的道路显得更为狭窄。

实际上，近世的东方民族大多是不顺的，都曾有过内忧外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乎都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而且面对的国际形势也是一样的。在此种格局里，按理说，中国尚处在比较优越的位置，拥有别的国家所不能拥有的诸多优势。第一，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第二，中华民族传统深厚，有几千年的文明积累；第三，中国人社会关怀意识强，甘愿舍小家而为大家，舍个人而为国家。而这一切都是当时中国的优越条件。只可惜，这些优越条件几乎都没有用在社会发展这一主题上，而是用之于偏途，用之于各式各样的闹剧，有的甚至还是对原有优势的破坏。50 年代末因大炼钢铁而大肆砍伐森林即是一例。

相比之下，那些国小民寡、资源匮乏、传统浅薄的民族反倒可以利用这和平年代发展经济，促进教育与文化的繁荣，并且日新月异，把中国内地远远地抛在后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是这样的。

中国人并非没有反思精神，不足的只是反思的进路和深度。面对历史发展的不顺，面对诸多的悲剧和闹剧，这些年来许多人都在反思，都在试图拨乱反正。民间的思想者是这样，掌握权力话语的人也是这样。

一个民族的发展，既为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亦需理论的指导。因而民族历史发展的不顺，既可能是实践的原因，又可能是理论上的问题。这就好像盖房子，如果蓝图没有纰漏，建筑质量则取决于施工的过程，或是没有按蓝图而施工，或是偷工减料，使之弄成“豆腐渣工程”。反过来理解，如果施工人员既没有偏离蓝图，又没有偷工减料，以次充优，那么房子的质量如何，则完全是蓝图本身的问题。这样的道理本来很简单。可是我们的国人在反思近几十年的中国问题时，常常只把失误的原因归之于实践，归之于施工人员，似乎所有的过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严守既定的理论，没有严格按照蓝图而施工。至于理论本身是否有问题，很少有人思考过。正惟如此，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犯错，亦一次又一次地反思，其结

果也就只能是，反思仍旧，错误仍旧。

社会发展的歧出和坎坷，虽然不能说没有实践上的原因，但是实践如果一再失误，而且诸多失误皆有着根源上的一致性，那么问题的实质恐怕就不在实践之本身了。实践是受理论支配的。如果理论是完善的，实践怎么可能一错再错呢？实践的偏差，容易拨乱反正；理论上的偏差，则很可能是一步错，步步错。而且情况还恰恰是，如果理论是偏差的，人们越是严格遵循理论，越有可能南辕北辙，越错越远。更难回答的问题是，指导我们实践的乃是一种被认为先进的理论，是引导我们向着理想社会的灯塔，为何一旦同实践相结合，却又很难体现其理想性呢？

七 怎样看待历史人物所应背负的历史责任？

历史是人的历史，但又并非是每一个人的历史简单相加的总和。虽然很难说每个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究竟如何，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只有极少数人走在历史运动的前列，或曰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这样的历史个人，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将是怎样的一幅画面。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正剧、喜剧，也有悲剧和闹剧。二者相比较，或许悲剧和闹剧更引人注目，对今日中国的影响也更大。然而，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闹剧还是正剧，主角都是那些风云人物，那些能够让后人记住的名字。

倘若按照以往所奉行的历史理论，这些历史个人同样是没有意义的，顶多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因为按照此种历史理论，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如同自然界的日出日没冬去春来。蒋介石必然失败，毛泽东必然胜利，就连孙中山联俄联共也是必然的，因为这诸多的必然由一个总的必然决定着，即人类历史的现代过程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到来。

此种历史理论在学理上的欠缺，随着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引入，现代许多中国学者已有了理性上的认识。而且，从一般的常理上看，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如果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结果，那么又如何说明革命在20世纪中国之意义呢？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个人之历史作用，又如何予以肯定？

但这并不是说，20世纪中国诸多不尽人意的历史事件，责任都得由历史个人来承负。别的不说，仅文化保守主义而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鼓吹尊孔读经。30年代，蒋介石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发动“新生活运动”，同样把传统儒学摆在至上的位置。可是时至90年代，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仍然把儒学奉为立国之道。这里面原因究竟何在？是历史个人的利益与好恶所致，还是历史力量的本身使然，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又比如，近几十年来的诸多闹剧，更是发人深思。“大跃进”时，亩产十万斤乃至二三十万斤的报表，国家最高领导人且出身于农村的毛泽东深信不疑；因“大锅饭”、大食堂的推行，头几个月就吃光了一年的口粮，致以一年之内活活饿死两三千万人；“文革”十年更是荒唐，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对此类不堪回首的一幕接一幕的历史闹剧，“文革”结束后的中国人一方面心有余悸，另一方面亦在积极地思考，试图从中吸取教训。他们或是将其归因为“失误”；或是归因为民主生活不健全，个人崇拜导致唯意志主义膨胀，只有“一言堂”而没有“群言堂”；或是归因为“四人帮”的野心与横行。

然而这种种解释，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仍然无助于对问题的根源性回答。因为，“失误”、“个人崇拜”、“四人帮”等等，既可视为原因，亦可视为结果。就后者而言，它同样是有原因的。这就是：一、诸多的灾难性事件固然是“失误”，但问题是，这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性的“失误”是如何造成的呢？是可以避免还是不可避免的？二、个人崇拜固然错误，但是为何在20世纪的中国，个人崇拜竟然比古代的皇权崇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蒋介石也搞个人崇拜，而这二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又极为不同。三、“四人帮”是“文革”的产物，其本身产生的原因亦有待究问，怎么可以将其作为根源性的答案呢？无疑，“四人帮”罪恶累累，但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这里。如果没有相应的历史环境和深在的历史原因，他们又如何能够兴风作浪和为害社会呢？

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的诸多灾难，诸多“失误”，大多都是在极其崇高的理想和口号下发生的。甚至可以说，理想越崇高，口号越响亮，大众的情绪越高昂，所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越是深重。其中，当然不可否认历史个人的巨大作用，但是这些历史个人，特别是毛泽东，怎么会丧失起码的理性判断乃至起码的常识呢？如果说个人崇拜有历史个人的主观原因，为何当时的国人（包括学者、教授）非但没有异议，反而欣喜若狂，如痴如醉？

八 中国人的启蒙何以如此艰难？

社会变革需要观念先行，何况中国的传统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更需在思想文化领域作一彻底的改造。关于这一点，虽然不能说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已经有了共识，但新进人物都在为此而奋斗，则是无疑的。就连权力话语亦在一再地强调改变观念，解放思想。甚至可以这么说，一个世纪里，尽管泥沙经常泛起，阴霾时常笼罩，但在思想文化领域，思想启蒙一直是时代的主题，一直为先行者所重视。从严复对西方学说的译介，梁启超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到新文化运动，再到80年代的新启蒙和9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学者们都是一种期盼，一个目标，即通过对传统的反思和批判，清除现代化途中的绊脚石。

然而，尽管启蒙为中国社会所必需，亦为新进人士所重视，但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思想启蒙，成效并不显著，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19世纪开始，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许多